

梁海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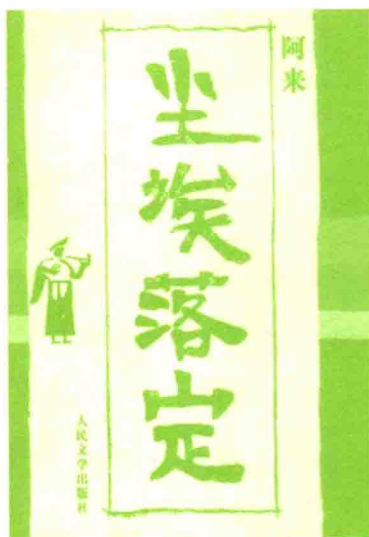
阿来文学年谱



阿来文学年谱



二〇〇九年十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展台前，阿来与德文新书《遥远的温泉》的编辑爱丽丝合影留念。



二〇〇〇年，阿来的作品《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是首部获得该奖的由藏族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尘埃落定》的封面。

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評語(節選)

《塵埃落定》……有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輕淡的一層魔幻色彩，增強了藝術表現開合的力度。語言頗多通感成分，充滿靈動的詩意，顯示了作者出色的藝術才華。（嚴家炎）

序言



记得三十年以前，我刚入复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章培恒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洪昇年谱》，受到学界高度好评。直至今日，我在百度上搜索书名，还会跳出这样的评价：“该书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列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将洪昇生平及其剧作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编制年谱，功在三个方面：一是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史料；二是对于谱主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对其人其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那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年

谱编撰是最花时间最吃功夫，同时也是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一种治学方法。研究者在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被不动声色地编织在资料的选择和铺陈中，而不像那些流行的学术明星，凭着胆子大就可以胡说八道。后来章先生指导研究生研究古代文学，也是先从研究作家着手，而研究作家先要从编撰年谱着手，于是就有了一套题为《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的年谱系列，这套书至今仍是我最珍爱的藏书之一。

章培恒先生的导师蒋天枢先生，曾在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受过陈寅恪、梁启超等名师指点，蒋先生晚年，放下自己的许多著述不做，集中精力整理恩师陈寅恪先生的遗著。一套书干干净净地出版了，最后一本是蒋先生编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用年谱形式，把陈先生一生的著述活动都保存下来，没有一句花里胡哨的空洞之言。后来缪托陈先生知己的学人名流有的是，却没有一个在陈先生受到困厄之苦时候“独来南海吊残秋”的。这些流传在复旦校园里的故事，既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也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

倒也不是说，做年谱就是有学问，大谈理论就不是真学问。章先生后来也是从史料考辨走出来，偏重学理史识，成为一位被人敬重的文史大家。但是我们从蒋先生

到章先生再到章门弟子的传承中可以看到,编制编年事辑(年谱)成为他们学术训练的一个基本方法。古代文学研究如此,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我早年追随贾植芳先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先生首先就指示我从搜集的大量资料中编撰一份“外来思潮、流派和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1900—1927)”的大事年表,罗列西方诸思潮流派在中国传播影响的编年记录;这份年表有六万多字,把这一时期中外文学交流关系的来龙去脉基本上都弄清楚了。后来我写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里使用的材料观点,基本上得益于这份大事年表。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培养研究生治学研究,从作家研究,或者具体问题研究起步,收集资料,编撰年谱或者编年事辑,是最好的训练方法。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都由此而生;为后来者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份绕不过去的研究成果。

可惜这种扎实的学术风气,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高校的研究生培养中渐渐式微,一些似是而非、华而不实的流行理论、外来术语、教条形式都开始泛滥,搞乱了青年学子的求知心路,也破坏了良好求实的学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严重。今林建法先生受聘于常熟理工大学,担纲校特聘教授与《东吴学术》执行主编。

林先生从事文学编辑三十余年,对于学界时弊看得清清楚楚,他首倡编撰当代作家年谱,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份作家的详细年谱,也为学科发展提供了信史。我赞成他的提倡,这个建议不仅有利于当代文学学科基础的夯实,也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学风培养开拓了一条有效的道路。

《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甲种:当代著名作家系列;乙种:当代著名学者系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希望这套丛书在林建法先生的主持下能够坚持若干年,不断开拓选题,为当代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2014年4月19日写于鱼焦了斋

一九五九年

阿来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州马尔康县的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村庄藏语名字叫卡尔谷，汉语名字叫马塘。这一地区在藏语中被称为“嘉绒”，意思是靠近汉区的农耕山谷。这个山谷绵延逶迤在邛崃山脉与岷山山脉中间，山下奔腾的则是大渡河、岷江及其众多的支流。有山有水的地方总是集聚着自然界的精华，注定是要兴旺的。或许正因为如此，“马尔康”在藏语中的意思，便是“灯火旺盛的地方”。山清水秀而人杰地灵，故乡的山水赋予阿来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同时也成为滋养阿来文学创作不竭的生活源泉。

“我从小长大的那个村子非常小，村庄住着大概有二百多口子人，每一户人家之间却隔着好几里地。到今天为止，我父母所居住的地方仍是孤零零的一家人。但这个村子在地域上又非常大，村子的东西向有一条公路穿过，大概二十多公里，南北向大致和东西向的距离差不多。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除了感觉到人跟人的关系之外，你还会意识到周围的世界当中有一个更强大的存在，这个存在就叫做自然界，河流、山脉、森林……在那个

地方，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四季的更替变换，当然还有跟我们人一样在活动的动物，每一种动物好像都有它们自己的社会秩序。”^①“我更多的经历和故事，就深藏在这个过渡带上，那些群山深刻的褶皱中间。”^②可以说，“色尔古村”、“觉莫村”、“觉巴村”，还有构筑了六卷本《空山》的“机村”，无不刻印着马尔康山水的印记。“它们并无奇风异俗，只是有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出人们难以察觉的自我本相。”^③

“阿来”在古藏语中意为“刚出土的麦苗”，质朴而又充盈着蓬勃的生机。正如日后他的创作，字里行间都透出朴拙的力量。阿来的母亲是藏族人，父亲是一个把生意做到藏区的回族商人的儿子。有时候谈到族别时，阿来会幽默地说，自己是个远缘杂交品种^④。阿来出生那年，“住进寨子的工作组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让他们加深对彼此的仇恨。女人和男人住在一起，生出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这些孩子便过着这种半饥半饱的日子。我

① 阿来、谭光辉等：《极端体验与身份困惑——阿来访谈录》（上），《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2期。

② 阿来：《大地的阶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7页。

③ 阿来：《熟悉的与陌生的》，《民族文学》2009年第10期。

④ 小雨：《阿来的光荣与梦想》，《人物》2005年第9期。

就是那样出生、长大的孩子中的一个”^①。阿来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是一大串的弟弟妹妹。儿女的众多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的艰辛，让阿来的母亲都无法给出一个阿来准确的出生日期，只能大概给出两个月份以供选择。

实际上，对于幼小的阿来而言，最令他苦恼的并不是食不果腹的物质匮乏，倒是“回藏混血”让天性敏感的阿来深受影响，以至于在他很多的早期作品中，都有一个叫做“阿来”的懦弱孩子的影子。偏僻的地域、艰苦的生活、“精神一片荒芜”，给幼小的阿来平添了孤寂敏感。于是，大自然成为阿来最好的伙伴和老师，宏阔而纯净的自然不仅锤炼了阿来坚韧的品格，也作为永恒的背景在他的作品中屡屡出现。无论是《大地的阶梯》中那些峡谷、群山、荒野和川流，还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里那些有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小小花朵，还有《空山》里被人类几乎破坏殆尽的山川秀林，无不诉说着阿来的写作与大自然之间的某种神秘联系，而这种联系恰恰构成了阿来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之处。

^① 阿来：《遥远的温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一九六五年

六岁。

阿来和村子里其他的孩子一样赤着脚在山地草坡上牧羊。“我也有过一个那样面孔脏污，眼光却泉水般清洁明亮的童年！想起日益远去的童年时光，内心总有一种隐隐的痛楚与莫名的忧伤！”^①阿来的童年充满了饥饿、困苦与辛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旧年的血迹》中生产队一年一度的大锅炖牛杂的“美餐”，村民眼睛里“闪烁着贪馋的光芒”，都是阿来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而《猎鹿人的故事》、《孽缘》、《守灵夜》中的残旧、空荡、寒碜的房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生活的缩影。

然而，困苦的童年并非没有甘甜，《少年诗篇》里那块“先尝到的是羊皮的味道和老人皮肤的味道，然后才尝到甜味”的沾满羊毛的冰糖，《蘑菇》中那煮在羊奶中鲜美异常的松茸，还有山野明丽的春天，都让阿来感到无比幸福。每到冬季，这个冰雪覆盖的村庄却又显出它神秘而动人的魅力，一家人聚在火塘边，晚上喝一点酒，弄一点

^① 阿来：《大地的阶梯》，第131页。

吃的，老人们讲着那些古老的充满魅惑的故事，有时还会高歌一曲，这些神秘的故事、粗犷的歌谣成为阿来最早的文学启蒙。阿来说：“尽管这里许多老百姓不识字，但文盲也有自己的文学，我就是听着那些流传在他们口中的民间故事、民歌、史诗长大的。这些民间故事或者史诗在流传过程中，又加入了许多人的智慧。我一直认为，我能成为一个作家，跟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有很大关系，民间文学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也成为我的创作资源。《尘埃落定》、《空山》等作品，莫不如此。”^①

艰苦的生活、美丽的自然、淳朴的乡情、古老的文化，使得阿来依然有着“单调而又明亮”的童年。

一九六六年

七岁。

阿来进入小学学习。这是一所只有两三间校舍，两个班合用一间教室，只有一名教师，进行复式教学的小学，条件极其简陋而艰苦。或许是天性使然，阿来并不像

^① 卜昌伟：《阿来：童年时听到的民间故事 成为最早文学启蒙》，《京华时报》2009年1月14日。

一般孩子那样,对上学读书充满恐惧,天性好学的他,对学校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求知的渴望。然而,在那个年代,求知欲本身就是一种罪孽。“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样一个贫瘠的村庄,对个体有着另外的要求,比如会打猎放羊、会干活身体好,如果太对文化感兴趣就会显得很孤独,而我却总想着学点儿别的。”由于家庭生活极度贫困,每逢寒暑假回家,他都要上山采草药、打柴,筹集书费和学费^①。付出体力还在其次,更为难过的是精神上的孤独。阿来说,每逢回校,都需要当时的生产队开证明证实假期表现,虽然他学习一直很好,但因为要赚钱存学费,无法参加生产队劳动,就拿不到证明。“没证明我就是个‘坏人’,而且砍柴还要偷偷摸摸怕被人发现,从小那种孤独其实来自于此。”^②

当时藏地要求普及汉语,因此,孩子一进入小学就要开始学习汉语。“在我成长就学的年代,恰恰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藏区的藏文教育在学校里被彻底取消。于是,我就在一个藏族地区上汉文学校。先后的两个小学教师,都是出生于四川内地乡村的师范毕业生。特别是

① 阿来:《词典的故事》,《中学生阅读》(初中版)2002年第1期。

② 上官云:《专访作家阿来:眼球经济时代,我不怕被遗忘》,中国新闻网,2013年3月19日。

我的第一位老师张玉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已经是我母亲的老师了。”^①当时的阿来并不知道命运的安排。多年后，与他的两位启蒙老师一样，阿来也步入了师范学校的大门，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阿来生活的马塘村，在海拔将近四千米的山脚下，这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驿道，从青海、甘肃、四川藏区通向成都平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茶马古道”。尽管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公路的开通，这条古道已经衰落，但这里与其他藏区的小村落相比，还是留下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传说，比传统意义上的藏区更加开放，很多人同时使用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可以说，从童年时代开始，阿来就已经游走在两种语言之间。

尽管如此，有一定汉语基础的阿来进入学校后，还是感觉到汉语学习的吃力。当时仅懂得非常简单的汉语的阿来，在上课时根本反应不过来老师在说些什么。这段痛苦的学习经历，让阿来终生难以忘怀，同时，也为阿来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起点。“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或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

^① 阿来：《大地的阶梯》，第104页。

离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分散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这是一种奇异的体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体验。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①

一九六八年

九岁。

小学三年级。

在进入小学的前三年时间里，阿来都被学习汉语的艰辛所困扰。“因为我觉得小学的汉语学习非常困难，尽管我们还算在整个藏区里头基础比较好的，之前多少懂

^① 吴怀尧：《专访阿来：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延安文学》2009年第3期。